

建本《孟子》如何促进中日文化交流

——专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院长张晓明

□本报记者 邱冬勇 文/摄

7月9日,由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共南平市委、南平市人民政府、武夷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中华文明课堂系列讲座第十讲顺利开讲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晓明受邀做客讲堂,带来题为《东亚儒学视域下〈孟子〉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》的专题分享。讲座结束后,本报记者对张晓明副教授进行了专访。



人物名片

张晓明,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,中华日本哲学会副秘书长,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。

建本作为中国宋代三大刻书体系之一,是闽北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瑰宝,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。其中,建本《孟子》系列典籍东传日本,深刻影响了日本思想、学术与文学发展,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鲜活见证。

本报专访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专家张晓明副教授,从建本传播视角,解读《孟子》在日本的传播轨迹、接受差异与文化价值,挖掘闽北建本在东亚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。

记者:长期以来,大众普遍知晓《孟子》是儒家经典,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,但民间一直流传“日本禁忌《孟子》、携《孟子》渡日船只必沉”的说法。首先想请您解惑,这一说法是否属实?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缘由?

张晓明: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明代谢肇淛的《五杂俎》,是中日儒学交流史上的经典说法,并非史实,却精准反映了早期日本对《孟子》的特殊接受心态。书中记载,日本愿意高价采购中国各类经书,唯独规避《孟子》,传言携带《孟子》的船只出海必沉没。这一说法在日本学界引发长期讨论,日本学者松下见林就明确驳斥了这种传闻,他指出《孟子》传入日本已有千年以上历史,赵岐注本、《四书集注》《四书大全》等各类《孟子》注解版本早已在日本流传,沉船之说并不成立。

而这—传闻能够广为流传、深入人心,核心原因是《孟子》的核心思想与日本本土神道教、天皇体制存在冲突。《孟子》推崇“汤武放伐”“顺天应人”的革命思想,主张君主无道则可被推翻,倡导君臣相对的伦理观念。但日本自古标榜“天皇万世一系”,天皇无姓氏、血脉恒定,不存在中国语境下的异性革命、改朝换代,这种思想冲突让早期日本对《孟子》存在天然隔阂与禁忌心态,也造就了这一特殊的文化传说。

记者:我们了解到,建阳是古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,建本典籍是儒学东传的核心载体。想请您介绍,建本《孟子》及相关典籍,是通过哪些路径传入日本的?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呈现出哪些特点?

张晓明:《孟子》的东传,贯穿日本古代、中世、近世三个核心阶段,依托僧侣游学、商贸往来、官方文化交流三大路径,层层递进、不断深化,是东亚儒学传播的重要脉络。

日本古代(古坟至平安时代)是《孟子》初传阶段。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通过遣唐使、入华僧人引入中国儒学典籍,日本官方编纂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明确记载了《孟子》十四卷赵岐注本,唐代陆善经注《孟子》七卷,其中不少版本依托复刻体系流传至日本。平安时代的《令集解》《宪法十七条》《日本书纪》等官方文献,已大量引用《孟子》字词与文句,比如《日本书纪》中“大丈夫”一词,本源就是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中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君子人格内涵,只是日本初期仅停留在字词、短句借鉴层面,尚未深度理解《孟子》的思想体系。

日本中世(镰仓、室町时代)是《孟子》深度传播的关键期,核心依托京都五山禅林文化。当时京都天龙寺、相国寺、建仁寺、东福寺、万寿寺五大官方禅林,是日本汉学研究的核心阵地。大量入宋、入元僧人成为建本典籍传播的核心媒介,圆尔辨圆等僧人先后赴华游学,从江南、闽浙一带带回大量儒学典籍。其中圆尔辨圆带回的典籍被整理为《普门院目录》,明确收录《孟子》相关注本,形成了目录记载与实物留存的双重佐证。这一阶段,《孟子》不再是单纯的文字典籍,而是成为日本禅林僧人研学、论道、创作汉诗的核心文本。

日本近世(江户时代)是《孟子》规模化、体系化传播的鼎盛期。德川家康推崇四书儒学,明确提出统治者可专精研读《孟子》以修身理政,极大推动了《孟子》的普及。这一时期,建阳刊刻的《四书大全》《孟子大全》等建本经典大量输入日本,被日本学界、私塾广泛采用。建本精良的刊刻工艺、完整的注解体系,成为日本儒学校勘、研习的核心底本,甚至被京都大学、国立公文书馆、筑波大学图书馆等学术机构珍藏、电子化留存,影响极为深远。



张晓明副教授拍摄建本雕版

记者:相较于其他版本的《孟子》典籍,建本《孟子》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中,具备哪些独特优势?对日本汉学发展起到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?

张晓明:建本能够成为《孟子》东传的核心载体,核心优势在于刊刻量大、体系完整、注解详实、流通性强。宋元明清时期,建阳是全国核心刻书中心,建本《孟子》系列典籍涵盖原版经文、历代名家注疏、儒学合集,版本体系完备,同时依托海上商贸航线,批量输出至日本,相较于其他地域版本,传播覆盖面更广、留存度更高。

在学术价值上,建本《孟子》弥补了日本儒学典籍残缺、注解零散的短板。日本学者山井鼎编撰《七经孟子考文》时,就重点参考了建本《十三经注疏》,依托建本完整的批注、校勘内容,完成了孟子经文的校正与梳理,其研究成果成为后世日本孟子研究的重要蓝本。同时,建本《孟子》承载的程朱理学注解体系,为日本儒学从佛学附庸走向独立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。

在文化影响上,《孟子》推动日本实现了从浅层文字借鉴到深度思想重构的转变。日本中世时期,五山禅僧依托《孟子》开展学术辩论、汉诗创作,将孟子“浩然之气”“仁义之道”等思想融入汉文学创作,诞生了大量兼具儒学风骨与日本本土特色的汉文学作品;近世时期,建本《孟子》成为日本图书市场的重要翻刻对象,推动孟子民本、仁义思想在日本民间与精英阶层

普及,重塑了日本的伦理认知与政治思维。

记者:《孟子》传入日本后,日本学界并未全盘照搬,而是结合本土国情进行了取舍与重构。依托建本典籍流传的孟子思想,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哪些认知差异与思想改造?

张晓明:孟子思想在日本的本土化改造,本质是日本为适配本土政治体制、社会伦理,对建本传入的儒学思想进行的选择性吸收与重构,差异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与伦理认知两大层面。

首先是对“汤武革命”思想的刻意规避与修正。《孟子》完整传承了儒家革命思想、君臣相对观念,但这与日本“万世一系”的天皇体制根本冲突。江户时代,德川家康曾多次与学者林罗山探讨汤武放伐的合理性,最终刻意弱化孟子的革命思想,强调君臣尊卑恒定,否定“以下犯上”,以此巩固幕府统治。同时,日本学者对孟子“舜弃天下救父”的孝道观进行重新解读,跳出中国传统忠孝辩证的框架,从心性本体论角度批判其片面性,强调法治与公义的重要性,适配日本武士阶层的契约伦理。

其次是伦理概念的本土化异化。以“大丈夫”为例,《孟子》诠释的是坚守道义、人格独立的君子品格,而日本早期文献中对该词的解读,更偏向勇武、刚猛的武士气质,弱化了道义内核。在“义利之辨”上,日本学者也突破了孟子重义轻利的原始主张,结合日本幕府武士的奉公、御恩契约制度,兼顾道义与现实功利,形成了适配日本封建社会的功利化儒学认知。

此外,日本还通过世俗化改造普及孟子思想。官方与学者过滤掉孟子革命、民本等敏感内容,将仁义、忠孝、修身等适配本土的思想,通过净琉璃、歌舞伎等民间文艺形式传播,让建本所承载的孟子思想完成了精英学术向大众文化的渗透。

记者:从建本传播视角来看,《孟子》东传日本的千年历程,对当下我们挖掘建本文化价值、深化中日文化交流,有哪些重要的启示?

张晓明:建本《孟子》的东传史,是闽北地域文化走向东亚、参与文明互鉴的生动缩影,有着极强的当代价值。

首先,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瑰宝。长期以来,建本文化的价值常被低估,但建本《孟子》等经典典籍跨海传播,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思想、学术、文学体系,充分证明闽北建本是东亚儒学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基石,是福建乃至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,值得我们深度挖掘、系统传承。

其次,文化传播是选择性吸收、融合创新的过程。建本《孟子》在日本的接受、批判与再阐释,体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普遍规律。中华文化对外传播,并非简单的文本输出,而是思想的交流互鉴、兼容创新,这为当下传统文化出海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最后,我想说的是,建本文化是当代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优质纽带。建本典籍搭建的中日儒学交流脉络从未中断。当下,我们可以依托建本《孟子》等珍贵文化遗产,开展版本研究、学术研讨、文化展览等交流活动,以典籍为媒、以文脉为桥,深化中日民间文化共情,推动东亚文明互鉴持续走深走实。

盛夏的闽北层峦叠嶂,绿浪翻滚。在中央苏区政和历史展示馆内,展柜中静卧的一只斑驳陈旧的黄腊药罐,常引得参观者驻足端详。这看似不起眼的黄腊,跨越百年烽烟,将老区人民的赤诚与红军战士的英勇紧紧熔铸。它从山野走来,不仅见证了革命年代人民军队与群众“生死与共、血脉相连”,如今更带着信仰的底色,在非遗传承的时代脉动中焕发新生。

烽火初逢

1934年8月,政和县东平镇西表村太平桥上,灼热的阳光与焦灼的期盼交织在村民眉宇间。远处蜿蜒山道上,一队灰色军装的身影如铁流般涌来。领头者目光如炬,正是中央红军七军团第二十一师第58团团长江黄立贵与政委陈一。

这支队伍的到来,不仅为山村带来革命的星火,更揭开了政和这片红土地上最为壮阔的篇章。太平桥上,红58团与杨则仕领导的政和地方党组织胜利会合。村民们涌上桥头,将煮熟的鸡蛋、新采的草药等物资塞给红军战士手里。

人群中,年过半百的老中医罗金碧手捧一罐温润如玉的腊膏,颤巍巍递到黄立贵面前。“团长,这是罗家世代秘传的黄腊,治伤有奇效。只盼着,战士们永远用不上它……”黄立贵郑重接过,肃然道谢。罗老汉摆摆手,脱口而出的那句话,如誓言一般刻进风中——“黄腊送红军,红军保太平。”

红58团进驻后,9月初先在西表村成立了建松政革命委员会,杨则仕任主席。9月底,在凤池村正式成立建松政苏维埃政府。同年11月,因革命活动需要,建松政苏维埃政府迁至西表村的魏氏祠堂。西表村由此成为闽北革命斗争的神经中枢之一。

鱼水情深

在西表村曹氏祠堂的梁柱下,红军建起了红星医院。名谓医院,实则简陋至极:门板拼成高低不平的病床,削磨后的竹片用作固定断骨的夹板,一口铁锅架在土灶上,煮沸的盐水便是最高级的消毒剂。这里药品奇缺,每一次战斗后,望着伤员肢体翻卷的伤口、因感染而肿胀发黑的肢体,军医都心如刀绞。

“医生,酒精棉用完了,金鸡纳霜也一粒不剩!”一次战斗后,护士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在这命悬一线之际,人们想起了老中医赠予的黄腊。打开罐口,一股清冽的药香瞬间弥漫,冲淡了屋内的血腥味。

据介绍,白芨止血生肌,白头翁清热解毒,三七活血化瘀,将它们与茶籽油一同熬炼,便生成了黄腊。医书记载,它扶正祛邪,可用于皮肤疮疡、外伤出血、烧烫伤及慢性溃疡的辅助护理。将信将疑的军医小心翼翼地为伤员清创,将黄腊均匀涂抹在狰狞的创面上。一阵清凉感如溪水流过焦土,原本痛得冷汗涔涔、低声呻吟的战士呼吸开始平稳。接下来数日,肿胀逐渐消退,脓血化为清液,新鲜的肉芽开始从伤口深处生长。

在战斗频繁、缺医少药的根据地,这黄色的药膏成为红星医院的“救命药”。它不仅帮助疗愈合肉之躯,更浇筑了军民之间牢不可破的情谊。每次红军出征,罗金碧都会备好黄腊作为随军药品,红军要付药费,他坚决不收,并再次重复:“黄腊送红军,红军保太平!”

薪火相传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当年倾囊赠药的东平镇罗氏家族,将这份“以药济世、以药助军”的祖训融入家风中,代代铭刻于心。

据介绍,罗家世代行医,祖上创办的“福和堂”医馆在当地颇有名气。走进罗家旧宅,一座略显破旧、约两米高的药棚静立厅堂,静数着百味人生。正厅墙上,一副嵌名联苍劲有力:“黄梅傲雪香飘远,腊蕊凌寒艳照天。”上下联首字巧妙嵌入“黄”“腊”二字,上联以梅喻枝,言其药香如梅花般远播四方,代代不息;下联则以蕊寄情,寓示着对生命康宁、美好生活的殷切期许。

近百年的风雨侵蚀,世事变迁,黄腊制作技艺却如山涧涓流从未干涸。2023年10月,“政和东平黄腊制作技艺”被列为南平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。今年4月,又被列入第八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前不久,罗氏后人携手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专家,成立了政和县正传统医药研究院,致力于收集和研政和当地中医药民间秘方。

据了解,该研究院还将同有关部门调研落实民间偏方传承者,协助引导后者申报“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”。

此外,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将“闽粹黄腊”上报申请省卫健委科技计划项目。

从民间草药到战地良药,从祖传秘方到省级非遗,黄腊不仅是中华传统医药智慧的结晶,更是老区人民与人民军队“双向奔赴”的生动见证。这份跨越百年的情谊,已深深融入闽北红土地的基因。

如今,西表村的红军桥依旧横跨在潺潺溪流上;红星医院的旧址,红58团团部的残垣皆在草木荣枯间无言诉说着当年土地革命的火热。村里老人们还能清晰地向后辈讲述那些如数家珍的故事——黄腊将年轻的生命从鬼门关拉回,太平隘大捷后村民组成的担架队在星夜下与死神赛跑……

每一个故事里,都跳动着—颗滚烫的初心。

见证老区人民与人民军队的双向奔赴——

一脉黄腊映丹心

□杨则生 文/摄



用团结协作
弘扬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咱们工人有力量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

西表村工农红军红星医院旧址